

中共十大罪恶

Baohz

中共看似强大，其实外强中干，因为它的军队、警察等维稳力量也是来源于中国人民，一旦这些人清醒过来，反戈一击，它的崩溃很可能只是瞬间的事情。

一、叛国罪

中共，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非中国人自己建立，而是前苏联通过自己操控的共产国际，派人携带经费来中国建立的苏共东亚支部，其成员表面上是中国人，背后受苏联控制，其活动经费和军火大部分都来自苏联。

中共成立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作为苏联在中国的马仔和帮凶，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为了维护其主子苏联的安全，中共大搞工农运动，鼓吹暴力革命，利用北伐战争加入和企图控制国民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蓄意挑起中日战争，用建立民主、自由国家以及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各种谎言骗取人民支持，再加上签订卖国条约得到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篡夺了中国政权。

二、卖国罪

中共从其建立之日起，一直到其篡政并统治中国七十多年，从未停止过卖国。

1921年7月23日，从作为苏俄东亚支部成立之日起，中共就开

始接受苏共提供的活动经费，并听从苏共指示，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发动暴动阻挠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

1929年，苏联趁国民政府忙于中原大战，出兵8万占领了东北，中共不但不予以谴责，反而公开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于1930年在多省市策划武装暴动，以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

1941年，中共公开赞同《苏日中立条约》和条约附件《前线宣言》，并为苏联开脱，而该条约中有这样的表述：“苏联根据宣言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抗战期间，中共为夺取政权，不仅秘密与日军勾结，而且还专打国民党。1941年，中共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华南情报局领导人潘汉年具体执行。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贸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潘汉年不久后携带中共中央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孰料，潘汉年等人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汪表示不相信中共。无奈之下的饶、杨、潘三人遂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双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是：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势力。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中共勾结日军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如此写道：毛于抗战期间通

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难怪毛泽东在中共篡政后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并且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偿要求。

抗战结束后，中共在出兵中国东北的苏军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了物资丰富的东北。史料透露，苏联人送给中共最大的礼物是：日军的枪枝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20万满洲国军队。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对苏军在东北烧杀抢掠强奸的暴行置若罔闻。

为了继续得到苏联在军事上的进一步的支持，中共与苏联在这一时期签订了两个卖国条约。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等和苏联代表米高扬等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协议规定：一、中共承诺苏联对中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朝鲜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议》。该协议的主要条款，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持苏联参战。

很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什么秘密协议，在将来把国土划归苏联。

通过签署上述两个出卖国家权益的条约，中共获得了二战中美国援助苏联的、价值34亿美元的武器，获得了大量飞机、大炮、坦克，装备了11个现代化的师，训练了30万原汉奸军队，甚至使得部

分苏联红军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官」、空军和坦克兵。这些举措，使中共的军事实力大增，可以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较量。

另一方面，美国也被中共的民主谎言所蛊惑，不仅强令已经将共军林彪部队逼入绝境的白崇禧部队停止进攻，还停止了对国军的军事援助，直接导致国军之后对战已经鸟枪换炮的共军时大败，丢失了政权。

篡政初期，毛和中共担心美国协助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反攻大陆，遂赶赴苏联，与其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以及两个秘密协议。

在秘密协议中，正式承认蒙古独立，让苏联保持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战时允许苏军在华据守，中国海空军基地交给苏俄，东北各港口交苏军使用；中苏以货易货，中国土产，特别是粮食，应尽量输俄；苏联在中国享有特别贸易权、铁路管理权并控制矿权；在中国一些地区，苏联人有自由居住权；应征一千万劳工给苏联等等。

1950年，斯大林指示毛泽东，要求进行中蒙边界调整，毛泽东迅速响应，立即指示成立中蒙边界联合工作组配合工作。经过此次调整，中国新疆北郊，原绥远，察哈尔省北部等共计1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蒙古国。之后，中共政府又将原中华民国地图上标识的诺门罕谷地、达里冈涯牧场、新疆北塔山、四分之三的贝尔湖划归蒙古国。外蒙古独立后，领土面积变的更大。

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数据，自1949年以来，中共当局主动放弃的领土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其中上世纪50年代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90年代承认被沙俄强占的领土，就达近300万平方公里。

这其中自然有毛泽东允许下出卖的国土，比如：1950年，放弃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1957年，将白龙尾岛（9.96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无法计算）让给越南；1960年，放弃南坎地区（220平方公里）、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划归缅甸；1962年，放弃威化岛及黄金坪岛（52平方公里），划归蒙古和朝鲜；1962年，放弃绸缎岛及薪岛（80平方公里），划归朝鲜；同年，将朝鲜视为圣山的长

白山以南划归朝鲜。

毛泽东和中共出卖中国利益的根本目的是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利益，在它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1999年12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该议定书明显是个卖国条约，因为它不仅将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割让给了俄罗斯，而且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了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具体来说，被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虽然有前清政府的几项条约，但一直有争议，这次则正式割出去了。

三、欺骗人民罪

中共于1949年建立政权，名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谎言，因为这个国家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人民没有人权和尊严，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也没有选票，不光是政权刚建立时是如此，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连普选都没有，这个国家怎配称人民的国呢？

中共自篡政以来，一党独霸政权七十多年，这样的国家居然也配称共和国？

中共自称“解放”了中国人民。如果说，在中共篡夺政权之前中国人民没有自由，中共来了之后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由，那倒是可以说解放。事实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中国人民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钱，可以出门逃荒，即便跑到国

外也很平常。然而，中共一来，中国人民都被圈禁起来，不要说出国，就连出村出镇都要审批，更不用说出国了。中共不光禁锢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就连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思想也被禁锢了。在中共没有篡政之前，中国人看书读报是比较自由、有很多选择的。学术研究非常独立，文艺创作异常活跃，各个领域都大师辈出。那时的中国人，宗教信仰也很自由，佛祖、基督、安拉是不受任何人领导的。中共掌权之后，中共领导佛祖、基督、安拉，中国人的思想就只有毛泽东思想，八亿人民八部戏。现在也是如此，中国人民只有一种思想，习近平思想。这就足以证明：中共根本就没有“解放”中国人民而是把中国人绑得更紧、捆得更牢。共产党没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还是比较自由的，共产党来了，中国人民才真正失去了自由。

毛泽东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其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谎言是毛泽东的创造，也是把中国人民欺骗得最彻底的谎言。事实是，中共掌权后，人民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服务，唯有被中共驱使与奴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结果是，毛在全国各地都有高档别墅，有专门的医疗组并享受各种特供。当全国人民连温饱都成问题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的超级富豪了。单毛的稿费一项，就是天文数字。最关键的是，毛的稿费收入完全凭权力谋得，不是老百姓心甘情愿花钱去买毛的书。当今习近平时代，习也喊为人民服务，结果同样是，习近平家族以及跟在习近平屁股后面的官员集团，他们的资产是普通百姓的千万倍，他们都将巨额的贪腐成果转移海外，让自己的家族成员去享受他们嘴巴上最讨厌的自由与民主的生活。这就是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真相！

中共垄断教育和宣传资源，对国人从小开始洗脑，强行灌输中共编造的历史，强迫青少年学习和接受其反动的思想和价值观，国人被淹没在中共用各种媒体、影视、文学作品精心编造的谎言世界中，致使大量国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在浑浑噩噩中成为了中共的奴隶甚至帮凶。

四、戕害人民罪

土地改革

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借口，用各种残酷手段，折磨和镇压中国的乡绅阶层，造成数百万地主家破人亡，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农村的精英阶层、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人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中共的“耕者有其田”是一个世纪大骗局，农民们不会知道，在他们领到土地证的时候，中共当局已经在制定收回全部土地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中共还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迄今都没有改变。

土改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土改前有些农民可能没有土地，但他们是自由的，可以到处走动以求生，甚至在走投无路时也可以去当兵或落草为寇。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两三年后又全都失去土地，而且随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意生产耕作，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共产农奴。

正因为农民被严密限制在农村，在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中，全国三到五千万（最高说法到九千万）非正常死亡。大饥荒中，灾民甚至无法外出逃荒。

中共篡政以来，土地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属于人民，它是中共权贵集团巨大的摇钱树和聚宝盆，注定是中共各派系抢夺的资源，中共巧取豪夺，使农民再次变成一无所有者。

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声称要开展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人们提出批评和建议。

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他们的观点甚至只是一般常识，但没想到落入了中共的“右派”陷阱，成为被打击对象。

在反右运动中，大量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艺术家和其他公众人物被指控为右派，并受到迫害、打压和处罚。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剥夺了工作机会，被开除、下放、监禁或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中共借助反右运动，虽然没有从肉体上消灭，但实际从思想上消灭了那些心存正义并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精英。

大跃进

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中共推行了大跃进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世界上人为制造的最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导致了社会动荡、暴力冲突和七百多万人的迫害和死亡。

六四事件

在1989年，中共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活动，导致了上万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和市民死亡。

反送中事件

1997年收回香港时中共承诺：一国两制，香港法律50年不变，50年后，更不能变，港人治港等等，2019年刚过22年就不算数了，

借故修订《逃犯条例》，导致港人强烈反对，两度爆发超百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抗议，却被中共定性为暴乱予以镇压，中共还勾结黑帮作恶，造成大量港人伤亡、被强奸、被自杀。

中共后又实行香港国安法，严重侵犯了香港的自治权和言论自由。

疫情和动态清零

新冠病毒是中共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生化武器，所以中共是这场全世界流行大疫情的罪魁祸首，详情放在后面反人类罪里面。

中共的“清零”政策，没有人道的考量与尊重，不是依据科学事实与公共卫生知识，没有区分病毒变种的不同型态与轻重之别，而是一味采取“文革式防疫”，一种不惜代价的蛮干和“只有隔离，没有治疗”的粗暴防疫。

防疫既要看数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学规律。当清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和经济损失远大于清零的效果时，清零政策就是不可持续的。当全世界都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让经济生产正常运行之际，只有中国逆风而行，其目的只有一个：以清零证明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面对新冠病毒，中共采取的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独断化”，所谓“治理”，实质上就是“控制”。在这种“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出了中共的体制暴力。

德尔塔病毒消失后，中共蛮横清零行为造成的死亡，远大于病毒导致的死亡，很多人被封控在家中得不到食物活活饿死，老年人无法去医院看病，孕妇无法去医院生产，居民楼失火因为楼道被封无法逃生活活烧死，强制隔离夜间转运导致客车翻倒多人丧命……

由于中共隐瞒数据，疫情期间中国死亡人数难以统计，仅在2020年2月，三大通信运营商手机用户数就减少了两千万。

五、侵犯人权罪

中共严重侵犯国人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

新闻自由

中共垄断了国人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媒体和出版物，并修建网络防火墙，全面阻塞了大部分国人接触真实信息的渠道，隐瞒真相，编造谣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诱使国人对社会和国际上发生的各类事件做出中共所希望的错误判断和反应。

言论自由

国人在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受到中共的严格监控和审查，被封锁在一个个信息孤岛上，无法向公众讲述自己的观点、经历和见闻，动辄就被警察警告和威胁不许发声、不许拍照或拍视频，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动辄被删帖和封号。

宗教自由

宗教组织必须向中共注册才能合法存在，宗教组织和信徒必须接受政府的指导和监管；中共通过宣传和教育系统对宗教进行负面宣传，将宗教视为迷信和封建思想，灌输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念，试图削弱宗教信仰的影响力；中共对一些宗教组织进行打压和取缔，尤其是一些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宗教组织，如法轮功等。这些组织被打压、迫害和镇压，其信徒遭受迫害和监禁；中共对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要求宗教组织必须在特定场所进行宗教活动，禁止在公共场所或者私人场所进行宗教活动。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监控和干预，限制宗教组织的人员流动和传教活动；中共对宗教教义进行控制和干预，要求宗教组织必须符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和价值观。政府对宗教组织的人员选拔和任命进行干预，试图控制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

政治自由

国人对政府的批评和政治异议受到严格限制和无情打压。政治反对派、异议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随时面临监视、拘留、起诉和刑罚，国人无法建立独立的政党和社团，中共的所谓人民代表不过是代表中共意志的投票机器而已，从未代表过民意。

六、侵占人民财产罪

公私合营

1956年中共违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做出的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承诺，假借公私合营的旗号，以极低的价格入股，将其建国前的朋友，统一战线的盟友，也就是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强行没收。

股市

中共长期通过散布股市假新闻吸引股民投资，暗中操纵股价等手段榨取股民财富，致使中国股市的投资失败率超过90%，这在全世界股市绝无仅有。

2015年中共甚至打出了“炒股跟党走”的口号，造成大量股民跟风，人为制造股市泡沫，然后迅速崩盘，导致大量股民财富被收割，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市总市值迅速蒸发了24.28万亿元

P2P

中共先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金融支撑平台为名义，鼓吹互联网金融，提出“鼓励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 and 个人的投融资需求。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探索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然后待投资人入局，以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借口侵吞投资人财

富。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中国 P2P 行业共有约 5,000 家平台关闭，涉及投资者的损失总额约为 1.4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2140 亿美元）。

大撒币

大跃进时代，中国人被活活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却向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非洲各国、东南亚、巴基斯坦、埃及……很多国家撒了几百亿、近千亿美元，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至少是几万个亿美元了！

当前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 1000 元，其中 2.8 亿人的月收入远远少于 ¥1000 元，只有 ¥537，折合美金为每天 \$2.53。他们每天的生活消费支出低于 \$2，以联合国确定的每天生活消费支出 \$1.9 的国际贫困线为基准，这 2.8 亿人实际是在国际贫困线下。

而近年来中共对外援助达到七千多亿美元，其中，对俄罗斯援助款是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如果将这些钱平均分配给国内 3000 家上市公司，每家可获得 20 亿元人民币。如果贷给国内小微企业，可以彻底解决全部 1000 万户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平均每户 60 万元人民币。如果用于“三农”，可以一次性实现全部一亿农民的小康目标，平均每户 6 万元人民币。如果平均分配给每个中国人，每人可得 4378.28 元人民币。

中共撒币也是为了洗钱，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太子党开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其实就是洗钱。

贪污腐败

中共是由上而下的独裁体制，从最高的大独裁者往下，每一个单位或部门都有一个小独裁者，不存在监督反馈机制，早已形成制度性腐败，可以说无官不贪。

按照 1990 年至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关于惩治腐败犯罪”内容的具体统计数据，可看到中共这三十多年的腐败现象不但有增无减，而且还与时俱进，节节上升，从“六四”后八十年代末期公布的贪腐数额 1 万元以上不满 5 万元起步，到 100 万元以上有 6 人→1993 年 100 万元以上有 31 人，犯罪数额最大达 313 万元→1998 年 100 万元以上有 174 人，犯罪数额最大的达 2100 万元。以后的历年报告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了，一定是贪腐数额太惊人吧，十八大以后上亿元的案例已比比皆是了。

从 1989 年“六四”之后出台的《反腐工作报告》到 2018 年赖小民被查处不到三十年的光景，查处的受贿金额不断刷新纪录。跟大家算一算，当初一个小县长到一个自治区副主席贪腐不足 2 万元起步至赵永正的 7.17 亿到赖小民的 17.88 亿，增长了 11.175 万倍。

中共这三十多年总是拿 GDP 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来炫耀政绩，中国 GDP 由 1989 年的不到 1.72 万亿元人民币（具体为 17179.7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90.03 万亿元，增长了 51.4 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近三十年来中共官员贪污受贿金额增长为 11.175 万倍与 GDP 增长为 51.4 倍相比较，可为土丘见泰山。

由此我们重新体会到当年“六四”时学生和广大市民提出的“争取民主、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等诉求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及时、多么的远见，哪来的动乱、颠覆？实际是善意地帮助中共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因为当时人们已发现腐败现象与经济发展形影相随，但是还是处于萌发状态，只在少数官员中发生，没有形成整体的、深层的和系统的腐败，所以如果中共能回应学生们的诉求，实

行政体制改革，开放舆论监督，成立反贪污腐败独立机构，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等，一定会把刚刚冒起的腐败现象压制下去，同时反腐倡廉会令整个社会风清气正，绝不会形成今天十官九贪的局面。可惜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集团，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坚持独裁统治，竟然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反对腐败的学生，制造震惊中外的“八九六四”事件。当“六四”屠杀过后，中共当局为了掩抹罪恶的血迹，做了一个反腐的假动作，转身就引领全民“一切向钱看”，于是九十年代在官场掀起一股贪腐逐利的狂潮，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成为各级官员追逐的目标，全党腐败由此而生，是中共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产生大腐败的起点。因此，“六四”镇压的后果就是关闭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却启开了中共官僚全面疯狂腐败的大门。

在中共以上每年的反腐成绩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共腐败的全景图：从小耗子到满目苍蝇，从小老虎到大老虎甚至巨虎，职务级别一个比一个大，形成中国官员腐败的大满贯：从小小的村官到科级、处级、部级以及各地省、地、市官员至正国级的周永康；腐败涉及的部门有政法委、军队、司法、公安、宣传、财政、金融、国企、政协、林业、文教卫，纪委等等多个部门，在官方的反腐报道，找不到哪一级官员，哪一个领域不出现腐败分子，就连所谓清水衙门的环保局官员，也利用环评监测、验收等手段，从中收受企业贿赂。可见当今官场已是全方位的系统性腐败，不像毛时代那种走后门、损公肥私、特殊待遇的小打小闹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八十年代那种沿海走私、倒卖批文，收受彩电、冰箱，极少数贪腐几十万或上百万的问题；而是贪腐数额惊人地达到过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问题。确实，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现在非法所得一般都超过千万，几百万元的腐败分子已基本绝迹了，而且越是级别不高的官员，腐败起来似乎越没底线，小官巨贪的例子比比皆是。

七、奴役人民罪

自篡政以来，中共长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教育奴役、精神奴役和财产奴役。

教育奴役

中共用统一教材和考试垄断了教育，用它作为给青少年洗脑的工具，灌输其编造的虚假新闻、历史、反动思想和价值观；用各种精心设计的作文题目培养他们紧跟中共谎言的习惯；不是因材施教，而用繁重的课业占据学生的全部业余时间，使他们没有独立观察和认识世界以及独立思考的时间；这实际上是一个将青少年培养成奴隶的奴化过程。

精神奴役

中共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

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财产奴役

首先是 70 年产权的房屋使用权，国人一辈子省吃俭用当房奴买下的房产，70 年后将丧失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差不多每一代人都要被中共重新收割一回。身为中国人，难道没有在中国土地上的居

住权吗？为什么要因此付巨款给中共呢？而且是每七十年一次，子子孙孙永远成为房奴。

中共官方资料显示，卫生总费用的 80%都用在党政官员身上。2021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 7.5 万亿，占 GDP 的 6.5%，其中，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 27.4%，约 20718.5 亿元。如果依旧按照 80%的比例算，1.65 万亿元用在了 850 万党官身上，其他 10 亿左右人只分到 4143 亿元。百姓人均 400 元，党官人均 19 万元！

中共施加在人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就更不用说了，沉重的负担导致各种商品质量越做越差，各种掺假、有毒食品层出不穷，注水肉、地沟油、毒奶粉、预制菜，各种黑科技与狠活泛滥成灾。

八、种族灭绝罪

中共通过限制和减少出生数量来达到毁灭新疆大部分维吾尔人的长期计划，犯下了灭绝种族罪。

至少从 2017 年 3 月始，新疆地方当局急剧升级了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派群体数十年的压制行为，其中包括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采取一系列政策、行为和侵权活动，有系统地对 100 万维吾尔人进行歧视和监控，限制他们旅行、移居和上学的自由，同时剥夺他们结社、言论和祈祷等其他基本人权；

对维吾尔族妇女采取强迫绝育和堕胎的措施，强迫他们与非维吾尔人结婚，并将维吾尔族儿童与家人分离。

至少有 100 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大多数讲维语的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西部地区的再教育营中。

中共正试图通过消除伊斯兰习俗，包括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和喝酒等他们信仰所禁止的行为，强行将维吾尔人融入汉族文化。

之前小学还用藏语授课，现在学龄前就开始以汉语授课，学校还

张贴“禁止讲藏语”等标语，名为“双语”教育，事实是把“藏语”变成单独一堂课，其他课程一律限用汉语授课，未来即使身上流的是藏人的血统，但都已经汉化，造成西藏新一代对藏语言、文化掌握都有问题，维吾尔族的未来前途正在遭遇毁灭性打击。

九、危害世界罪

输出革命

中共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共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挝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这些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一带一路

中共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程，所到之处，拉拢、腐蚀接受国的官员，继而达到更深远的、在政治上控制的目的。

中共通过“一带一路”不仅输出它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输出它的腐败、贪污、专制极权价值观。

“一带一路”只不过是中共全球扩张野心的借口，它的影响已经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强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中共在扩张过程无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一带一路”充满了各种腐败的行为，行贿受贿无处不在，它自认为这是它的制度优势。

“一带一路”不仅没有使缔约国受惠，反而使其陷入巨大的债务陷阱，深受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掠夺和被中共血汗企业剥削的痛苦，

以致各国重新反思中国种种不公正契约带来的新殖民主义。

其它活动

中共还利用西方的新闻自由在西方建立实为中共媒体的假媒体，四处散播谣言和输出其反动思想和价值观。

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作为其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在中共对美高校认知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海外建立同乡会，作为中共代理人。

十、反人类罪

制造新冠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原本是在进行针对非典（SARS）病毒起源的研究，并透过设在美国纽约的一所慈善机构获得了美国政府援助资金，此外，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与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技术。

2016年，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带领的科学家团队在云南省墨江的矿井中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但中国当局未对世界发出警告，也没通报相关死亡事件。如今，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前就存在的新冠病毒唯一近亲。墨江发现的病毒被送往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内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成为机密。报道引述一名美国调查人员说：“报告档案开始变得不透明，机密计划就是从此刻展开。”美调查人员：中方计划让病毒对人类更具感染力。

《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美国国务院调查员报告指出，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以民间机构自居，但美国已确定该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合作。至少从2017年起，武汉病毒研究所代表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美国调查人员相信，中方这项计划导致了新冠病毒产生，并在一场实验室事故后外流到武汉市内。一名调查人员认为，情况愈来愈清楚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涉及制造、传播和隐匿新冠疫情大流行。报道披露，美方人员发现的证据证明，2019年11月有从事相关实验的中国研究人员出现类似感染新冠的症状而送医，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的家属死亡。一个月后，武汉出现新冠病例。

疫情源于实验室而非华南市场

该报披露的另一项分析则显示，最初的疫情来源中心靠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而非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中国军方人员被授予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主管职位。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讨论了SARS病毒如何代表一个“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可以“人为地操纵成一种新出现的人类疾病病毒，然后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

调查人员还注意到，武汉实验室培养三种突变病毒并进行试验后，创造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超级冠状病毒，而这仅是台面上与西方合作的研究部分。调查人员认为，解放军当时也正同时进行病毒研究计划。报道指出，相关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确凿证据，却因为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受到阻碍。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公开了墨江发现的冠状病毒研究结果，也曾引起其他国家专家质疑，中国政府可能篡改了相关数据，以避免外界向墨江方面发掘更多真相。

报道还披露，中国解放军疫苗专家周育森曾与武汉科学家合作研究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冠状病毒，并且在疫情期间也在与武汉科学家合作。周育森受到外界怀疑是因为他在2020年2月就申请新冠肺炎疫苗专利，当时距离中国承认疫情爆发才过了一个多月。

周育森2020年5月死亡，时年54岁。有目击者告诉美国调查人员，周育森是从武毒所屋顶跌落身亡，作为一名屡获殊荣的军事科学家，中共罕见地没有对他的死进行任何报道或悼念。

结语

中共诞生于共产主义邪灵之传播，后期又掺杂进了中国古代恶政“驭民五术”以及厚黑学、帝王术等糟粕，造就出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邪恶的魔鬼，为害人间至今已过百年。

自中共 1949 年篡政以来，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苦难，中共号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邪恶的中共匪徒从此开始骑在了人民的脖子上，颐指气使、呼来喝去、作威作福，国人从此失去了人的尊严，再也没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如同拉磨的毛驴一般，被戴上了眼罩和嚼子，只留下耳朵用来听主人的号令和迷魂曲，稍不留神就会招来主人的皮鞭。

疯狂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文化大革命，不堪回首的疫情大流行和变态的动态清零，这些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惨剧，在中共的统治下，似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就发生了，之前已经发生，现在还在发生，如果还不铲除中共这个毒瘤，未来必将继续发生！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共在香港的倒行逆施，让全世界看清了它的真面目，它在国际上已经众叛亲离，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国人也逐渐了解和认识到了中共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国人加入了反对它的行列。

中共不会甘心失败，它正在执行新的邪恶计划，研发更多新冠病毒类生化武器、大量制造核武器等等，它已经成长为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毒瘤。如不及早铲除，势必给全世界带来更多的苦难。

不过，中共看似强大，其实外强中干，因为它的军队、警察等维稳力量也是来源于中国人民，一旦这些人清醒过来，反戈一击，它的崩溃很可能只是瞬间的事情。

中共之恶，罄竹难书，其身兼恶毒性与欺骗性于一身，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即使是中共颁布的法律，也不过是障人耳目的谎言，

所以，千万不能信其鬼话，否则早晚必遭其暗算。

中共不除，世界难安！其作恶多端，早已恶贯满盈，可谓十恶不赦，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铲除中共恶魔！